

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反响与启示 ——对 1924—1925 年间报刊舆论的考察

◎李 源

摘要:孙中山于 1924 年底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,随后借助各种宣传手段,掀起了声势浩大的“国民会议运动”。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,是孙中山政治理想的体现,同时,国民党对此主张的宣传鼓吹,也有现实方面的考虑。在种种政治纠葛之中,舆论对孙中山的主张也不乏非议之声。本文考察当时报刊的记载和评论,分析来自不同立场的声音,以求更好地认识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时代反响与现实启示。

关键词:孙中山;国民会议;善后会议

中图分类号:D69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2-3562(2016)03-0068-04

对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,研究界已多有论述^[1],本文仅通过考察当时报刊的相关记载、评论,分析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在其中所受的毁誉,以求丰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和思考。晚清新学家多已认识到现代报刊的价值,唐才常曾谓“报馆即史馆”,并称道其“语无忌讳,言多实录”^[2];史家陈寅恪也指出,传统史学中的史论“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,若善用之,皆有助于考史”^[3]。由此看来,近代报章的相关记述,无论在史料价值与思路启示方面,都有着重要意义。下文即在广泛披阅报刊史料的基础上,对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试作探讨,以就正于方家。

一、理想与现实之间:国民会议主张

的提出与宣传

孙中山在 1924 年 11 月发表的《北上宣言》中,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。随后孙中山多次对之加以申述,直至留下“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”的遗嘱,把召开国民会议作为最后的遗命^[4]。第 640 页。

孙中山对于国民会议的热忱,确有至情至性的一面,在生命垂危之际,更表现得淋漓尽致:去世前两天,孙中山曾召汪精卫、孙科诸人至榻前,告以“欲促成国民会议,以解决国是”的愿望,“言下泪夺眶而出”;去世前天,“于此病状万分沉重中,又急呼‘国民会议’、‘同志奋斗’等语,逾十分钟”^[5]。可见其对国民会议的热心执着。

收稿日期:2016-05-23

作者简介:李源,女,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助教。广东 广州,510030。

《北上宣言》发布不久后,段祺瑞即拟入京就任临时执政,并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与国民代表会议。随后国民党与段政府展开政治角逐,双方关于国民会议的分歧,也成了争议的焦点。孙中山一派甚为注重宣传造势,借以增加政治资本。当时报道称:“北方范围内各省区,国民党势力本较薄弱,故孙决定从宣传入手,以期他日能选出多数代表,其用意之深、着力之猛,已可概见。”^[6]

孙中山曾对新闻记者表达了“希望报界一致鼓吹”之意^[7],并向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、西安、张家口、归化、热河十三省区派出国民会议的宣传员^[8];在全国政治中枢的北京地区,更是特意遴选重要分子九人,前往各界接洽^[9]。在作为国民党大本营的广东,其宣传更是热火朝天,东方通讯社电文称:“广东国民党反对善后会议运动,近来益为露骨。各团体各以通电,集会讨论等手段,努力宣传,中央执行委员会,为促成国民会议拟举行示威运动。并设法与各团体结合。”^[10]又谓:“广东民党促进国民会议运动,最近益为激烈,各中国报大概为各团体宣言或通电所占满。”^[11]

正如时论所指出的:孙中山的主张“冠冕堂皇,易博大众之同情”^[12]。国民党的努力宣传,也得到了积极响应。尤其在孙中山北上抵京之后,各团体更纷纷表达对其主张的拥护,报道称:“国民之盼望国民会议实现,几乎全体一致,故函电如雪片飞来,各种促成团体,亦如春笋之勃然滋长。”^[13]在此舆论攻势下,段祺瑞方面也感受到了压力,当时消息称:“执政府近接各省区请速召开国民会议之通电颇多,已知民意之趋向,势难再事延绥而不召集。故由段执政令知许世英从速筹备,以便于善后会议闭幕时,即行召集。”^[14]

孙中山的本意,即是希望借舆论攻势来与执政府抗争。孙氏曾在演讲中鼓动各人以函电形式促开国民会议,称:假若“所打的电报有几千张几万张,这种和平的争法,好过用武力的几千兵和几万兵。”^[4]^{第371页}国民党方面也以此向执政府施压,在《对于善后会议之宣言》中,即声称:“自宣言(按:《北上宣言》)公布以来,海内外

各民众团体,群起响应,函电络绎,披露报端,为国人所共见。而各处国民会议促成会,更风起云涌,进行极猛。宣言所主张,为人民心理之所同,于此可证”^[15]。可见其宣传鼓吹,不无现实利好。

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,既有其政治理想的诉求,也有着现实政治的纠葛。而既卷入现实政治,争议的产生便也在所难免。在得到舆论推波助澜的同时,报刊评论中对孙中山主张的责难也并不少见。

二、时论对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非议之声

考察当时的报刊评论,对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非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:(一)认为其空悬理想,不切实际;(二)指责其故为高论,言行不一;(三)质疑其假托民意,别有目的。

“国民会议”固然是良法美意,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无先例可循,究竟该如何操作,也无明确的法规可据。当时法制院在制定组织方法时便颇费踌躇,“连日集议数次,尚未致规定方法”^[16]。时评即指出:“不唯人民方面无此种经验,政府方面,除慎重将事外,亦无若何之发展计划。”^[17]故对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,时人多质疑其可行性,如陈炯明便曾谓其“无非一种幻想而已”,认为“此种会议纵能召集,则参与会议之代表,所代表之党派既不相同,而所抱之政策与要求又不一致,能否和衷共济,共趋一途,尚属不可议料”^[18]。关于其与实力派间的关系,时评也不无顾虑,认为:“现在的军阀财阀官阀诸实力派,他们的利益,是与平民们的利益有许多冲突的地方。若纯靠平民的主张来定办法,则其办法必有许多不利于实力派的先生们的,定出来之后,他们反对,不肯奉行,则一切仍成画饼。”^[19]有评论则对国民会议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,指出:“中国今日不患无救国之法,而患无救国之人,当此武力万能时代,国民会议即产生,国民会议所谓决之方案,即确足以救国,亦宁即有见诸实行之余地……国民会议诚高矣美矣,然何法可以使国民会议之实现,且何法可以使国民会议议决之方案可以见诸实行,此点不能

解决，仍空谈耳。”^[20]

孙中山一派与执政府之间的恩怨也颇引人关注，有时评即认为：国民党对善后会议的抵制，系为“意见争执”^[21]。有评论者指出，孙中山认定善后会议违背民权原则，乃是主观偏见，而“事前遽断”^[22]。而孙中山指谪善后会议为军阀、政客之间的“分赃会议”，则被论难者还之以其人之道。如有研究系背景的《晨报》，便多刊载抨击国民党的社论，谓“孙氏年来凭恃武力摧残民权与北方军阀相伯仲……其反对善后会议，不过属于政治上之方便”^[23]；“表面反对官僚军阀式之善后会议，而实际又利用军阀官僚势力，以鼓吹其一派把持之国民会议”^[24]。

另一种论调，则是质疑孙中山的用心。与国民党屡有过节的《香港华字日报》便为此甚力，指责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系“假借民意以倒段”^[25]；挖苦其“武力争不得则民意，民意闹不来则又武力”^[26]。《盛京时报》也曾刊文指出，国民党之所以与北京执政府意见不合，实则系由于江西地盘之争执，国民会议的争议“只可谓为表面的”^[27]；《晨报》评论则称，国民党“以民字为招牌”，系为“抬价上比较便益而已”，实则与军阀“皆为之一丘之貉”^[28]；天津《益世报》也刊载时评，认为国民会议即便得以召开，亦恐为国民党所把持：“更恐孙氏主张之国民会议，非中华全国之国民会议，而仍为一党一派之国民会议，其危险将有倍于善后会议者矣。”^[29]

由此可见，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，虽由于宣传得力，获得较大范围的舆论支持，但社论时评的质难，实则亦从未停歇。这也为后人对孙中山国民会议思想的评述提供了另一种思考。

三、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启示

时人曾指出国民会议思想的西方来源，称：“国民会议之名，见于法国宪法，而其制昉自欧洲古代，今瑞士各州亦犹行之，美国则名曰宪法会议。”^[30]而其在中国的开展，则导源于近代以来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仿效。1911年，各独立省份制定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，其中便有“召集国民会议”之说；在随后的南北和谈中，国民会议也屡被提及；其后如张东荪等人亦时有呼吁^[31]。而国民会议在近代中国见诸实践，则是1915年

的事。其时袁世凯筹备恢复帝制，拟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问题，便成立了“办理国民会议事務局”，并公布《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》。然其手段与目的，却与民主政治的宗旨大相径庭。此次召集国民会议的动机，正如当局在致各省区的电文中所言：“所以必采取文明国家制度，不惜委曲繁重以求之者，盖对外之关系实较之对内为重。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后，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，颇示赞成之意。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举籍，更多方运用以济事实之穷，是对内多一分斡旋，对外少一层棘手。”^[32]可见其所关怀者全不在于民意。而此次国民会议为人诟病，更在于袁氏的操纵投票，使得“民意机关”的意味荡然无存^[33]。然而国民会议的形式，仍旧吸引着各方的兴趣，并于1920年代形成高峰，如研究者所指出的：“成了1920年代初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相互斗争或妥协的一面旗帜。”^[34]孙中山在1924年提出国民会议主张，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势，鼓动起国民热情，促成其政治觉悟。当时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即在宣言中指出：“盖中国之内乱外患，为人民不起闻问政治，委之于少数人包办之过。吾人今日应当痛改旧非，起而参加国政。”^[35]在这股热潮中，时人亦感到“国民会议已渐由理论进为事实”^[36]，对之满怀期待。

对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与“军政一训政一宪政”的革命程序论之间的关系，当时即有评论者指出，“孙先生北上时候主张召集国民会议，原是为应付当时特殊情势之一种办法”，并注意到国民会议因其理想色彩，确与现实政治有所违和，告诫道：“在军政、训政时期，绝对实行一党治国的时候，忽然产出来一个号称代表国民全体的国民会议，是不是于已经纷烦的政治局，又多加上一重纠纷的因素，反而使革命政治，难于进行？今日主张促成国民会议的人，大约之看中了国民会议表面上的美名，而没有计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实际的复杂问题吧。”该文还提到：“若是国民党的反对党利用国民会议这个机关，来和国民党为难，形势便不免更加纷扰了。”^[37]这个告诫似乎也一语成谶，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国民会议，便饱受多方质难^[38]。孙中山所留下

的国民会议遗命,因其浓重的民主理想色彩,成为民主抗争的思想武器,也给国民党的“党治”造成了相当的制约^[39]。而作为一种政治信念,孙中山关于国民会议的理想与情怀,依旧有着恒久的启益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相关研究主要有王水湘. 国民会议运动 [J]. 历史教学, 1985 (2); 王金铨. 论国民会议运动 [J].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, 1985 (5); 潘肇. 孙中山为召集国民会议的斗争 [J]. 史学月刊, 1985 (5); 赵金康. 国民会议思想评析 [J]. 河南大学学报 (社会科学版), 2004 (5).
- [2] 唐才常. 史学略论 [A].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. 唐才常集 [C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: 41.
- [3] 陈寅恪.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[A]. 陈寅恪集·金明馆丛稿二编 [C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1: 280—281.
- [4] 孙中山. 孙中山全集. 第11卷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6.
- [5] 孙中山昨日逝世 [N]. 北京日报, 1925-3-13.
- [6] 国民党宣传与鲁郑 [N]. 晨报, 1924-12-25.
- [7] 孙中山之行踪 [N]. 北京日报, 1924-11-21.
- [8] 国民党大宣传 [N]. 晨报, 1924-12-24.
- [9] 中山派员在京宣传国民会议 [N]. 京报, 1925-1-5. 该九位委员分别是: 罗驭雄、郭春涛、黄日葵、纪人庆、于国桢、姜绍谟、刘瑛、王东珍、王师曾。
- [10] 反对善后会议 [N]. 晨报, 1924-12-19.
- [11] 广东国民会议运动之猛烈 [N]. 顺天时报, 1924-12-22.
- [12] 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 [N]. 北京日报, 1924-12-20.
- [13] 国民会议促成会 [N]. 京报, 1925-1-4.
- [14] 国民会议已在筹备中 [N]. 北京日报, 1925-1-12.
- [15] 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宣言 [N]. 盛京时报, 1925-2-7.
- [16] 国民会议组织问题 [N]. 晨报, 1925-1-13.
- [17] 所望于国民会议者 [N]. 天津益世报, 1925-1-6.
- [18] 陈炯明对于时局之谈话 [N]. 北京日报, 1925-1-10.
- [19] 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 [N]. 京报, 1925-2-24.
- [20] 我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 [N]. 香港华字日报, 1924-11-27, 1924-12-2.
- [21] 再说善后会议 [N]. 中华新报, 1925-2-7.
- [22] 善后会议与民权原则 [N]. 京报, 1925-1-31.
- [23] 军阀心中之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 [N]. 晨报, 1924-12-26.
- [24] 告孙文 [N]. 晨报, 1924-12-31.
- [25] 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 [N]. 香港华字日报, 1924-12-20.
- [26] 我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 [N]. 香港华字日报, 1925-1-9.
- [27] 民党对段政府不满之内幕 [N]. 盛京时报, 1924-12-29.
- [28] 善后会议与党人 [N]. 晨报, 1925-2-1.
- [29] 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 [N]. 益世报, 1925-2-1.
- [30] 修平. 论国民会议 [J]. 大中华, 1915, 1 (3).
- [31] 张东荪. 国民会议之主张 [J]. 庸言, 1913, 1 (21).
- [32]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. 北洋政府档案·办理国民会议暨筹备立法院事务局 (4) [M]. 北京: 中国档案出版社, 2010: 178.
- [33] 如1916年云南政报发行所便刊印《民意徵实录》、《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》, 将当局各密电公布于世, 以揭露其操纵民意的黑幕 (见章伯锋, 李宗一主编. 北洋军阀 (1912—1928) (2) [M]. 武汉出版社, 1990.); 同年梁启超亦作有《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》一文, 谴责袁氏政府的此番行为。
- [34] 孙宏云.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职业代表制 [J]. 广东社会科学, 2007 (1).
- [35]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 [N]. 京报, 1925-1-5.
- [36] 国民会议 [N]. 中华新报, 1924-11-26.
- [37] 松子. 国民党与国民会议 [J]. 现代评论, 1928, 7: 174. 当代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: 孙中山在1924年的国民会议构想, 系为应对时势的临时措施, 是一种现实主义策略。参见桑兵. 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演变 [A].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[C]. 中山大学出版社, 2001; 孙宏云.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职业代表制 [J]. 广东社会科学, 2007 (1).
- [38] 周鹏林. 二十世纪二、三十年代社会各界对国民会议的主张 [D]. 北京: 首都师范大学, 2009.
- [39] 丘哲. 由一党召开“国大”想到邓演达先生的论国民会议 [J]. 中华论坛, 1946 第2卷: 7, 8.

责任编辑: 李玲